

《地下世界》中的伦理与政治：核竞赛的伦理选择与冷战妄想狂的记忆重构

Ethics and Politics in *Underworld*: Ethical Choice of Nuclear Arms Ra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emory of Cold War Paranoia

陈俊松 (Chen Junsong)

内容摘要：在1951年10月4日这天《纽约时报》的头版上，有两条并列的大标题：左边是巨人队打出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本垒打，最终夺冠；右边是苏联又进行了一次核爆炸实验。在以这两个事件为背景、堪称冷战史诗的小说《地下世界》里，当代美国著名小说家德里罗采用了回溯性叙述，全景式地再现了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剑拔弩张。《地下世界》深刻揭露了美国 and 苏联为了赢得核竞赛所做出的伦理选择及其给国民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伦理后果。小说对美苏之间开展意识形态对抗、彼此固守根深蒂固的敌意和偏见的冷战思维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那段特定的政治氛围下冷战妄想狂的文化记忆。

关键词：唐·德里罗；《地下世界》；伦理；政治；冷战；文化记忆

作者简介：陈俊松，文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哈佛大学富布赖特研究学者（2018-2019）。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叙事学、文化记忆理论方面的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化记忆理论与战后美国文学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6CWW02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s and Politics in *Underworld*: Ethical Choice of Nuclear Arms Ra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emory of Cold War Paranoia

Abstract: The front page of *New York Times* of October 4, 1951 was dominated by two parallel titles: on the left “Giants Capture Pennant, Beating Dodgers 5-4 in 9th on Thomson’s 3-Run Homer,” on the right “Soviet Second Atom Blast in 2 Years Revealed by U.S.; Details Are Kept a Secret.” Drawing on these two events, Don DeLillo’s massive novel *Underworld*, in its reminiscent narration, delineates the fierc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old War rivals in a panoramic fashion. In particular, *Underworld* exposes the ethical choice made by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which were competing for supremacy in the nuclear arms race, and the serious ethica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to their citizens and the ecological system. It offers a critique of their engagement i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adherence to deep-rooted hostility to and prejudice against each other. As an epic novel about the Cold War, *Underworld* reconstructs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Cold War paranoia of that special political climate.

Keywords: Don DeLillo; *Underworld*; ethics; politics; the Cold War; cultural memory

Author: Chen Junsong, Ph.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241). His areas of research includ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narratology, and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Email: jschen@english.ecnu.edu.cn).

引言

在 1951 年 10 月 4 日这天《纽约时报》的头版上，有两条并列的大标题：左边是巨人队的汤姆森用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本垒打以 5 比 4 战胜道奇队，最终夺冠；右边是美国情报部门探测到前苏联在两年内第二次进行原子弹爆炸。在某种意义上，棒球代表着民众对娱乐活动的狂热，蘑菇云则代表了终极毁灭带来的恐惧，而这二者的并存，可以说代表了冷战时期美国的生存状态。以这两个事件为背景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 1997）被评论界普遍认为是当代著名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 1936—）最重要的作品。有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一部主要的当代美国小说，也许那个十年 [1990 年代] 最受关注的作品”（Ruppensburg and Engles 2）。《地下世界》曾长期占据畅销书榜，是世界各国读者了解 20 世纪后半叶美国历史的重要文学文本。自出版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后现代主义、叙事学、消费主义、生态主义、垃圾美学、媒介文化等视角对《地下世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除了个别学者关注到了小说中的技术伦理之外¹，探讨这部小说的伦理价值和批判力量的研究迄今暂不多见。

所谓文学的伦理价值，是指“文学的正面道德教诲价值”（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 88）。一般而言，伦理学关心的是“道德价值和正确的行动”（程栋 1）。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中，伦理主要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在道德行为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的道德准则与规范”（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54）。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借鉴和吸收西方伦

1 朱荣华的论文对《地下世界》中的技术伦理进行了探讨，指出小说谴责了冷战时期过于迷恋技术理性，倡导环保地使用技术。参见 朱荣华：“《地下世界》中的技术伦理”，《外国文学评论》（1）2012：185-200。

理批评和中国道德批评的基础上创建的一种新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在聂珍钊教授看来，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传统的道德批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从今天的道德立场简单地对历史的文学进行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而是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进入文学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Ross 10）。在一次访谈中，耶鲁大学英文系教授克劳德·罗森（Claude Rawson）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首要价值不仅在于它是系统性的学说，更在于它鼓舞学者参与到文学文本交流的实践中来”，而且其“伦理内涵突出地表现在它摆脱了规定性或定义性的束缚”（Chen 390-391）。文学伦理学批评以其鲜明的伦理视角和跨学科视域为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

道德教诲和政治批判原本是早期文学批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随着唯美主义、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文论（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的兴起，审美原则成为了文学批评的基本规范，文本自身一度成了意义的唯一来源，文学的伦理和政治解读遭到排斥。然而，即使是以质疑宏大叙事、反对权威、去除中心为主要追求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也无法将文学同伦理和政治完全割裂开来。有学者甚至指出，“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文学与道德哲学的交叉与融合显得越来越突出”（刘英 94）。

著名后现代主义文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在其《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1981）一书的开篇写道：“本书将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重要性（priority）。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也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Jameson 1）。同时，詹姆逊还指出，“在本书中，我们将较少关注那些形式或文体、纯文本的分析模式”，而要为“仍是当今文学和文化批评的主要形式（predominant form）”的伦理批评（ethical criticism）“留出首要的篇幅”（Jameson 44）。事实上，在当代西方众多的批评理论当中，伦理批评和政治批评（或称意识形态批评）这两种批评方法不仅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还非常密切。著名美国伦理批评家布思（Wayne C. Booth, 1921—2005）在其《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 1988）一书中写道：

王尔德论述的方式显示了为什么严肃的伦理批评无法最终和政治批评脱离开来。当我们在谈论个人在变化时我们也是在谈论社会在变化。正如大多数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家们所坚持的，伦理和政治是相互依存的（depend on each other）。然后，我们也许可以把“伦理的”这个术语进一步拓展，将其涵盖所有的政治批评，作为与很多人称为意识形态批评大致相当的一个同义词。（Booth 12）

如此看来，伦理批评本身就包含了政治批评，二者完全可以综合运用以揭示文学作品中的深层意蕴。在《地下世界》这部堪称冷战史诗的小说里，德里罗采用回溯性叙述，从棒球、原子弹、核废料等具有典型美国特征的文化要素作为切入点，追述了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的整个冷战史，全景式地再现了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政治氛围。在解读《地下世界》时，小说中蕴含的伦理警示意义和政治批判不容忽视。本文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和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聚焦《地下世界》中的伦理和政治，考察小说如何反思和批判美苏为了核竞赛所做出的伦理选择及其对国民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伦理后果，并重构那个特定政治氛围中冷战妄想狂的文化记忆。

一、棒球与原子弹：美苏对峙的隐喻

“冷战”（cold war）这个词较早出自英国著名政治小说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于1945年10月19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你和原子弹》（“You and the Atom Bomb”）的文章。在杜鲁门总统下令对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两个月以后，奥威尔在震惊之余，预测世界上会形成这样的景象：“两三个巨大的超级大国，每个都拥有在几秒钟内毁灭数百万人的武器，他们把世界分成两半”。在这样的核恐怖平衡下，会出现“既不可战胜又与周边国家处于永久的‘冷战’状态”的新格局（Orwell 9）。1947年4月16日，美国金融家、总统顾问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在南卡罗来纳州众议院的演讲中使用了“冷战”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美国和苏联之间日趋冷淡的关系。这种状态与二战期间它们曾是并肩作战的同盟这一事实形成鲜明对照。他警告在场的听众，“让我们不要受到欺骗——我们今天正处于一场冷战当中”¹。此后，“冷战”一词被广泛用来指代二战结束后美苏这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超级大国及其盟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舆论宣传等众多领域展开的对峙和竞争。而从1949年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堪称冷战期间美苏对抗最紧张的时期。相对于通常意义上的战争，“冷战”虽然没有硝烟和炮火，但在敌对的两个阵营之间仍然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奥威尔在使用“冷战”一词时是跟原子弹相联系在一起的，德里罗的长篇巨制《地下世界》也是以写苏联进行原子弹爆炸开篇的。众所周知，美国秘密研制原子弹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德国可能造成的威胁，但纳粹德国在美国原子弹试验之前就投降了。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可德沙漠里成功爆炸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随后把原子弹实际运用于针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对苏联这个战时同盟却日益感到担忧和不安。二战期间，美国和欧洲盟国非常依赖苏联军力来共同应对德国。但现在有了原子弹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在对付日本这个问题上，美国对苏联给予军事帮助的需求不复存在了。因此，事实上“原子弹本身加深了苏

1 参见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0/04/bernard-baruch-coins-term-cold-war-april-16-1947-035862>

联和美国之间的不信任”（Gaddis 25）。而斯大林认为“广岛震惊了整个世界，平衡被毁灭了……这绝不允许”（Gaddis 26）。随着苏联在研制原子弹方面的追赶，并于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了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美国本土随时可能遭受来自苏联的原子弹袭击，这几乎成为整个五十年代美国民众最大的担忧。

《地下世界》的情节当中有三条核心线索：1. 原子弹试验与美苏之间核军备竞赛；2. 鲍比·汤姆森那个本垒打棒球的下落；3. 尼克·谢的垃圾处理公司的经营活动与核废料处理。从惯常的角度来看，棒球与原子弹似乎没有任何关联，将二者联系起来显得有些突兀。但在小说中，棒球与原子弹却被赋予了独特的联系。棒球无疑是20世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运动，而纽约同时拥有属于国家联盟（National League）的两支劲旅：纽约巨人队（1958年后改名为旧金山巨人队）和布鲁克林道奇队（1958年后改名为洛杉矶道奇队）。这两支球队都曾创造过辉煌的战绩，堪称势均力敌，都颇受球迷喜爱。1951年11月3日巨人队对阵道奇队这场锦标赛无疑受到全国的广泛关注，纽约的本地球迷更是强烈希望能获得冠军。虽然这只不过是场棒球比赛，但双方你争我抢、互不相让，双方的球迷几乎随时会大打出手。在某种意义上，巨人队与道奇队在球场上的比拼与当时美国与苏联在核武器上的竞赛颇有几分类似。

这场比赛最终以巨人队在得分落后的情况下，在第九局打出一个本垒打而戏剧性地获胜而告终。那个被媒体称之为“惊世一击”（The Shot Heard ‘Round the World’）的本垒打，其名称其实出自美国著名超验主义思想家、诗人、演说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诗作《康科德赞歌》（“Concord Hymn”，1837）。在这首诗歌里，爱默生对在美国独立革命中打响“惊世一击”第一枪的美国先辈表达了赞扬：“精神的力量，让他们敢于 / 去死，而让他们的子孙自由 / ”（Emerson 130）。因此，鲍比·汤姆森这个扭转赛局的“惊世一击”实际上也被赋予了战争的隐喻意义。此外，棒球和原子弹还被作家赋予了更加具体和实在的联系。经过艰苦的对抗，巨人队因为鲍比·汤姆森打出了个戏剧性的本垒打，最终以五比四的比分获得了胜利。“巨人队胜利了！”这场势均力敌、分毫不让、比分紧咬的比赛给在场的观众以及收听电台转播的听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娱乐盛宴。而与此同时，身在看台上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却从手下的特工那里获得了苏联刚刚在某个秘密场所进行了一次核试验的情报。此时，看台上的观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喊声，胡佛想到的却是“吞噬众多城市的热核”（DeLillo, *Underworld* 24）¹。在这里，巨人队的反败为胜与苏联在原子弹研发落后美国情况下取得第二次核爆炸成

1 本文有关《地下世界》的引文均来自 Don DeLillo, *Underworld* (New York: 1997), 译文为笔者自译, 有些地方参考了严忠志的中译本: 唐·德里罗: 《地下世界》, 严忠志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年), 特此说明。

功之间也产生了某种神秘的联系。作家借小说中的一个人物——马文之口，直接道出了棒球与原子弹之间的这种关联：“整个事情似乎很有趣，因为苏联人在造原子弹时，听好了，他们造的那个放射性核的尺寸就跟棒球一样大”（DeLillo, *Underworld* 172）。因此，那个一语双关的“惊世一击”，无论指的是汤姆森的本垒打还是苏联的核爆炸，可以说宣告了冷战的开始（Fitzpatrick 155）。

在历史上，汤姆森那个本垒打的棒球下落不明，但在《地下世界》里这个棒球却被赋予了一段离奇的经历。它先是被溜进赛场的黑人男孩科特·马丁抢到并带回家，然后被科特的父亲曼克斯·马丁偷偷拿到扬基体育馆外以32.4美元卖了前来观看比赛的棒球迷查理。查理后来把棒球交给了儿子查克，查克把棒球弄丢了。而狂热的棒球纪念品收集者马文·伦迪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这个棒球的下落，他后来把这个棒球以34,500美元卖给了尼克。尼克退休后在重新整理书柜时，发现了当初买下的汤姆森本垒打的这个棒球。因此，这个数度易主、几经辗转的棒球经历了从1951年棒球比赛到1990年代尼克回到凤凰城的曲折历程，成为整个冷战史的一个见证。

二、“下风者”和“畸胎博物馆”：冷战中国家对公民的伦理责任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政治的主体实际上处于不断的演变当中。古希腊哲学家（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是用城邦来定义政治，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等）则用上帝和神学来定义政治，而随着西欧的教会统一体在16世纪解体，作为中立统一体的现代国家（如法国、英国等）逐渐成为定义政治的主体。国家和公民的关系也就成为了西方政治学讨论的核心主题。随着社会契约、自由主义等理论逐渐成为主导思想，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被视为西方现代国家存在的主要目的。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国家有义务保障全体公民的生存、食物、合适的衣着以及不损害健康的生活”（孟德斯鸠 518）。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States and Citizens: History, Theory, Prospects*, 2003）这部由剑桥学派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人主编的论文集中，学者们着重探讨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在第三章《公民及其国家：回顾与展望》里，作者分析了作为臣民、纳税人、士兵等不同身份的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指出“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体之间（intersubjective）的关系”（Poggi 42）。公民服从国家，履行纳税、服兵役、保境卫土等义务，国家则应该维持社会稳定，保护公民的安全、利益和尊严。国家与公民之间不仅存在法律关系，而且还存在伦理关系。学贯中西的著名哲学家梁漱溟也注意到，“旧日中国之政治构造，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因此君臣官民之间存在伦理上的义务（梁漱溟 82）。英国哲学家索利（W. R. Sorley）在“国家的道德责任”（“The Morality of Nations”，1891）一文中指出，“国

家行为是,或者应该是,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牺牲财产,甚至是牺牲生命,只有是为了共同福祉时才是正当的”,因此,“国家必须看作对其公民负有责任”(Sorley 436)。尽管国家的道德与个人的道德不同,但并不意味着国家没有道德要求。不仅国家对其公民负有道德责任,而且还对其它国家也负有道德责任。公民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国家也有保护公民生命和健康的责任。

冷战是决定 20 世纪后半叶世界格局最重大的政治和军事现实。冷战期间很多重要事件都出现在了小说《地下世界》里,如朝鲜战争、支持者为麦卡锡请愿、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越南战争等。但与关于冷战史的历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不同的是,这些事件在小说中只是一笔带过。《地下世界》真正要表现的是美国民众心理上的脆弱与敏感以及美苏为了核竞赛所做出的伦理选择以及造成的严重伦理后果。

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个核心术语,伦理选择“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伦理选择 [ethical selection] 指的是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伦理选择 [ethical choice] 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道德选项的选择,选择不同则结果不同,因此不同选择有不同的伦理价值”(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6-267)。有学者指出,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伦理选择最常见的有两类:“一类是将危害社会和伦理秩序的伦理选择转换为警示或劝诫;另一类是将体现楷模或榜样作用的伦理选择转换为道德范例进行鼓励”(陈后亮 40)。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并保护国民的生命和健康,还是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意识形态上的激烈对抗,这是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面临的重大伦理选择。显而易见,这两种道德选项将带来完全不同的伦理价值。美国和苏联研制原子弹是为了获得绝对的竞争优势。试验成功后,这两个国家拥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军事优势。然而,实现这一目标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牺牲本国国民的生命和健康。在小说《地下世界》中,地上试验时期内华达测试基地的工作人员和“下风者”(Downwinders,指住在下风位置的居民)因吸入放射性尘埃出现多发性骨髓瘤、肾衰竭、身体萎缩、呕吐、严重脱发等种种病变(DeLillo, *Underworld* 405)。埃里克告诉马特:“到处有婴儿生下来便缺胳膊少腿。一个本来健康的女人洗头发,结果头发一碰就落。你知道吗,她是个美人,一分钟之前还是满头黑发,转眼之间便完全秃顶了”(DeLillo, *Underworld* 406)马特问:“这样的情况出现在什么地方?”埃里克说:“主要在犹他州南部,我听说,因为那里处于下风位置。不过,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它地区。有的人得了腺癌。有的人像《旧约》出埃及记中满身出现大红疮。还有人长满大斑点和疹子。咳嗽之后大口吐血。捂着嘴巴的两手流淌鲜血,那是放射物引起的”(DeLillo, *Underworld* 406)。这些美国人民没有受到苏联原子弹的袭击,却受到美国核试验放射性尘埃的危害,造成了永远无法挽回的伤痛。

与此同时，苏联也在哈萨克斯坦秘密进行核试验，也因核辐射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当地居住的人民沦为实验品。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市，维克多带尼克和布赖恩参观的“畸胎博物馆”（Museum of Misshapens）时看到的种种畸形和惨状：

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他管它叫畸胎博物馆。那个地方隶属于医学研究所，低矮的房间里摆满装有胎儿的展柜[……]其中有一件标本是双头胎儿。一个日的脑袋是身体的两倍，一个大小正常的脑袋长错了地方，出现在右侧肩膀上。

[……]

后来，我们看到那个独眼畸胎。那只眼睛长到额头中间，两只耳朵长在下巴上，根本没有嘴巴。（DeLillo, *Underworld* 799）

站在原子弹试验基地，在新墨西哥州从事武器开发的马特和与俄罗斯和独联体高级官员关系密切的维克多开始怀疑，美国和苏联政府当年可能蓄意让一部分人暴露在核辐射当中，甚至用“小孩、婴儿、胎儿和精神病人做实验”，以便研究这种辐射对人体的伤害程度（DeLillo, *Underworld* 417-418, 801）。受到核辐射污染的环境将对人类的生存造成长久的伤害。有学者指出，“被用作核反应器燃料的铀-235的半衰期是 7.1×10^9 年。考虑到与安全存贮废弃物相关联的问题，这个半衰期为这代人提供了损害尚未出生的，或者甚至是想象中的数代人的可能性”（Dobson 220）。

为了获得军事上的战略优势，美国和苏联做出的伦理选择都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甚至犯下了泯灭人性的滔天罪行，完全背离了国家对公民应负有的伦理责任。当小说中的尼克问维克多：“有谁记得我们那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维克多回答道：“为了竞争，你们赢了，我们输了。你必须告诉我心里感觉如何。大赢家”（DeLillo, *Underworld* 793）。“为了竞争”，维克多道出了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展开一系列竞赛和对抗的目的所在，这也是冷战最本质的特征。生命权和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权。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了拥有绝对的力量遏制对方，美国和苏联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偏执当中。冷战期间美苏为了核军备竞赛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让无数国民沦为核辐射的牺牲品，破坏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正常的政治伦理关系，造成了严重的伦理后果。

三、从内华达到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的生态伦理后果

伦理一般是评价和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秩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伦理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大。很多超出个人、家庭、社会之间道德的问题也被纳入伦理讨论的范围，因此医学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等新话题应

运而生。被誉为“生态伦理之父”的著名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7—1948）在其《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1949）一书的《大地伦理》（“The Land Ethic”）一文中指出“伦理范畴的扩大事实上是生态演化中的一个过程”（Leopold 202）。长期以来，在有关伦理的讨论中，自然界或生态系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利奥波德写道，“[直到 20 世纪中叶] 至今还没有一种伦理涉及人与土地、人与生长在土地上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Leopold 203）。他首创了“大地伦理”这一概念，“将[人类]共同体的外延扩大了，把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纳入其中，或者可以用一个词来合称：大地（land）”（Leopold 204）。利奥波德“大地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打破人与自然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传统观念以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将自然界视为与人类平等的成员。他写道：“简言之，大地伦理改变了现代人类在土地共同体中扮演的角色，使其从征服者变为共同体内的普通成员和公民。这意味着对其他正式成员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于共同体本身的尊重”（Leopold 204）。

在人与自然的伦理秩序当中，是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还是将自然视为攫取财富的源泉、赢得核军备竞赛的试验场，这是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面对的又一个重要的伦理选择。二战后，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秘密进行核试验，而距离拉斯维加斯 65 英里的内华达试验场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核武器试验场。1951 年至 1992 年期间美国政府在此进行了 1021 次核试验。而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试验场则是苏联最主要的核试验基地。从 1949 到 1989 年这四十年间苏联共在这里进行过 456 次各类核试验。尤其是 1989 年在此进行最后一次实验时发生核泄漏，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放射性污染。冷战期间，美苏之间为了疯狂的核竞赛，不仅给试验场当地居民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危害，而且让承受核试验的大地变得千疮百孔，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永久性的破坏。德里罗在《地下世界》中深刻揭示了消费社会的发展、美苏冷战核竞赛给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伦理带来的危机。

尼克·谢（Nick Shay）是《地下世界》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整个小说可以在某种层面上被看作是他的传记。他介绍说，“我供职的公司与废物打交道，处理废物，买卖废物，研究全球废物处理问题[……]我们是废物管理人员，废物巨头，处理全球的废物”（DeLillo, *Underworld* 88）。垃圾处理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是消费社会生产方式当中重要的一环。垃圾的不断增多甚至还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随着美国在 20 世纪二十年代左右进入消费社会，大规模生产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同时垃圾堆积也变得日益严重，并已成为影响人们思维的一种力量。小说借其中一个人物德特威勒之口说：“不消费就死亡。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提出的要求。它最后都以倾倒告终。我们制造了大量的垃圾[……]我们让垃圾影响我们，控制我们的思维”（DeLillo, *Underworld* 287-289）。为实现攫取巨额财富的目的和满足消费的欲望，美国

社会陷入过度的生产、消费、扔弃的惯性当中，使正常的生态系统不堪重负。学者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主张，“规模有限的行星不能维持无限的经济增长，因此人们必须时刻注意经济的规模以及它对相关的可获得的资源的影响”（Dobson 258）。利奥波德也指出，“如果单纯以经济的利己主义为基础，环境保护体系必定失衡，走上死路”（Leopold 214）。垃圾也引出了我们对于小说标题《地下世界》（*Underworld*）含义的思考。显然，德里罗希望小说的标题具有某种多义性和模糊性。但它首先指向了在地下堆积成山的垃圾，因为越危险的垃圾掩埋越深，这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世界”。

此外，尼克对垃圾（尤其是核废料）还有着不同寻常的认识，“如今，废物具有一种神圣的光晕，一种不可触摸的侧面”（DeLillo, *Underworld* 88）。废物之所以变得“神圣”是因为这些废物（尤其是核废料）非常危险，让人心生恐惧。出于利己主义，这些处理垃圾的巨头选择把这些核废料深埋在地底深处或海底：“他们身穿登月服，把成桶的危险废物深埋于地下的盐床中。那地方是数百万年以前的中生代海洋干涸以后的遗迹[……]人们怀着尊崇感和恐惧感，把受到污染的废物深埋起来”（DeLillo, *Underworld* 88）。小说中尼克曾对维克多说，“在武器和废物之间，存在一种不可思议的联系[……]武器和废物是一对神秘的双胞胎[……]废物是秘密的历史，是地下的历史”（DeLillo, *Underworld* 791）。垃圾，尤其是核废料，不仅以无声的存在记录了美苏之间的核竞赛，还揭示了核试验严重破坏了人类与环境的“共生关系”（symbiosis）。

冷战期间，美苏为了赢得核竞赛进行了上千次的核试验，产生了巨量带有放射性的核废物。这种完全人造的毒害性垃圾最终却要我们赖以栖息的大地来承受和消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尼克得知，“在那个原子弹试验场，一共进行了五百次核试验，全在该市的西南面。即使大气核试验停止之后，因为地下爆炸挖掘的竖井深度不够，不能防止非常危险的辐射泄漏出来”（DeLillo, *Underworld* 799）。正如学者聂珍钊所指出的，“人类作为自然的主体”，应该“担负起保护和修复大自然的道德责任”（聂珍钊，“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31）。在处理核废料和保护环境之间，小说揭露了美国和苏联再一次在利己主义的驱动下选择了破坏自然而不是保护自然。虽然他们对核废物“产生了一种类似印第安人对土地的崇拜”（DeLillo, *Underworld* 289），但他们处理的办法不是修复，而是深埋和毁灭，让大量受到放射性污染的土地无法自我修复。维克托曾对尼克透露说：“我们并不挖掘，我们深埋它[……]我们通过核爆炸的方式，毁灭遭到污染的核废物”（DeLillo, *Underworld* 791）。在利奥波德看来，“大地伦理体现了一种生态的良知，而这反过来又反映出一种信念，即个体对于土地健康负有责任。这里说的健康，就是土地自我更新的能力”（Leopold 221）。《地下世界》中反映的美苏这

种一味索取、肆意破坏生态的行为，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逃避了人类对保护自然应有的伦理责任。美苏双方在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核军备竞赛和生态保护之间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表现了其背后狂热的对抗心理和妄想狂。

小说最后用“把一种渴望传遍这座城市阴冷的各个街区，向外飘过沉睡中的小河和果园，直至那孤寂的群山”的“和平”(Peace)这个一词结尾(DeLillo, *Underworld* 827)。这是小说沉痛地追述完整个冷战史后表达对未来的祈盼：不仅国与国之间停止战争，而且人类也不再对自然如此肆意毁坏，“召唤着世界所有的人，召唤着文明与自然的和平共处”（朱荣华 200）。

四、“13”与“卧倒躲避”：冷战妄想狂的记忆重构

在传统的观念中，文学只被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和记忆保存的一种手段。在这种观念当中，文学是被动地当作记忆的携带者(carrier)。而在文化记忆的视角下，我们还看到文学能主动地参与记忆形成和重建，因为书写本身就是一种记忆行为。正如德国学者雷娜特·拉赫曼(Renate Lachmann)所指出，“文学是文化的记忆，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手法，而且也是众多的纪念行动……写作既是一种记忆行为，也是一种新的阐释”(Lachmann 301)。小说“序幕”部分写到的那场巨人队与道奇队的比赛是在1951年10月3日举行的。这个看似稀松平常的日期，在冷战氛围中都可能产生特殊的意义。尼克对西姆斯和法里什说：“我认为，第二天我便开始觉得各种各样的信号都指向13这个数字。到处都是噩运。[……]我记住了一个，那场比赛的日期。10月3日或者13。把月份和日子加起来，就得到13”(DeLillo, *Underworld* 95)。在西方文化中，“13”这个数字通常代表着“不幸”、“噩耗”、“灾难”等等，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对这个数字的恐惧症。在《地下世界》中，巨人队夺得国家联盟冠军和苏联两年内第二次原子弹爆炸的日期包含有“13”，而这个数字在尼克的头脑中一直挥之不去：

自从前一天那场比赛结束以后，尼克脑袋里一直想着13这个数字[……]今天一整天，他脑袋里全是13这个数字。他要找一只铅笔把它们记下来才行。

布兰卡穿着13号球衣。

布兰卡今年赢了13场比赛。

巨人队开始棒球锦标赛时，落后道奇队13场半。

昨天那场比赛的日期，10月3日。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得数是13。

巨人队今年赢了98场比赛，输了59场比赛[……]9、8、5、9。把这四个数字加起来，把这个得数倒过来年，明白多少了吧？讨厌的家伙。

那个本垒打出现时的时间：3：58。把分钟数加起来，得数是13。

除此之外，如果你想知道每局得分情况，你可以拨打的电话号码是ME7-1212。M是英语字母表中的第13个字母；如果把电话号码中的五个数字加起来，得数又是13。

再看一看Branca这个名字吧[……]B的位置是2，R是18，以此类推，Branca这几个字母所处位置的字数之和是39。39有什么玄机呢？如果除以举行那场比赛的日期3，你得到的是13。

汤姆森的球衣号是23，减去举行那场比赛的月份10，你知道得数是多少了吧？”（DeLillo, *Underworld* 678-679）

在这里，尼克将与数字13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情景拼贴在一起，使人感到眼花缭乱、不可思议，同时也再现了冷战氛围中人心惶惶、敏感脆弱、疯狂荒诞的心理状态。

在《地下世界》中，美国人对来自苏联的原子弹袭击的焦虑和恐惧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一条重要线索。历史上，美国于1945年7月率先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这给美国民众带来的是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和优势地位。在美国政府和不少科学家的认知当中，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美国会一直保持这种核垄断地位。然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给美国带来了无底的恐惧和不安，他们的生活从此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小说中，即便是在国家联盟锦标赛这样的重大赛事，也有不少棒球球迷因担心遭遇危险而选择待在家里收听电台的转播。布莱恩·格拉斯克与棒球纪念品收藏者马文·伦迪在回忆那次巨人队与道奇队的比赛时曾说：

“那是当年一场重要的比赛，为什么有那么多座位空着呢？”

“许多年以来的重要比赛。”马文说。

“许多年。”

“因为某些事情具有无意识恐惧的性质。我从内心深处坚信，人们在空气中感觉到某种灾难，关心的并不是谁将赢得比赛。某种可拍的力量会抹去——那个词语怎么说的？”

“抹去。”

“对，抹去。它可能抹去比赛这一档事。你得明白，在整个五十年代，人们待在室内，仅仅开车时才到外面去[……]。”

“换句话说，那时存在一种隐秘的心理：待在家里吧，因为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威胁”。（DeLillo, *Underworld* 171-172）

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美国的战略优势顿时丧失。随着美苏之间的对立日益加剧，美国民众担心广岛和长崎的悲剧

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进入五十年代以后，美国民众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变得越来越近。因此，作家才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出整个五十年代人们感到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威胁”。政府、军队、学校、媒体、娱乐界都在围绕可能遭遇苏联的核打击而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演练和鼓动。在马特上的天主教学校里，修女埃德加在教室里带领学生进行遭遇原子弹袭击的演练“卧倒躲避”（DeLillo, *Underworld* 718），一遍遍训练应对原子弹袭击的六条准则（DeLillo, *Underworld* 728）。小说中，颇受观众欢迎的脱口秀演员伦尼·布鲁斯更是直接对观众反复宣告“我们全都要完蛋了！”（We're all gonna die!）这种带有明显调侃意味、在娱乐场合发出的“预言”，给观众实则带来极大的震撼，伦尼每隔一段时间就重复一次这句话，似乎暗示危险正一步步临近。在政府的宣传和媒体的渲染下，人们心理上集体呈现出遭受来自苏联核打击的妄想狂。在苏联解体后，仍有美国民众心存疑虑：“苏联解体是真的吗，还是欺骗西方的一个阴谋？”（DeLillo, *Underworld* 81）《地下世界》真实再现了冷战时期美国民众心理上的脆弱与疯狂，揭示了冷战期间美国陷入遭受苏联核打击的受害妄想狂并沉溺其中、不可自拔。

结语

冷战是特定历史时期和地缘政治下的产物，它已结束将近三十年。虽然关于冷战的记忆正渐行渐远，但它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在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兔子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兔子歇了》（*Rabbit at Rest*, 1990）中，主人公曾不无诙谐地问道：“没有了冷战，做一个美国人有什么意义呢？”（Updike 509）。对于作家而言，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带有某种巨大的吸引力，能激发自己创作的雄心，在文学中再现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和时代印记。在一篇题为《历史的力量》（1991）文章中，德里罗曾写道，“遗忘的历史变成了小说中细致的编织物。小说就是让事情再经历一次（“Fiction is all about reliving things”）。这是我们的第二次机会”（DeLillo, “The Power of History” 63）。

《地下世界》向来被视为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巅峰之作。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世界的当务之急就是伦理转向”（刘英 91）。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教诲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文学产生的积极作用，是一种引人向上的道德力量”（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7）。作为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地下世界》主题宏大、人物众多、结构复杂、叙述方式独特，让读者对传统线性叙事的期待落空。实际上，在“情节淡化”（plotless）、“碎片化”（fragmentation）、“非线性”（non-linear）这些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背后，蕴含着小说对于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和苏联的伦理反思和道德教诲。小说揭露了冷战期间美苏为了核竞赛做出的伦理选择破坏了国家与公民、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伦理秩序，深刻剖析了这些违背政治伦理和生态伦理的

行径背后的偏执与疯狂。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卷入意识形态对抗，小说也对这种固守根深蒂固的敌意和偏见的冷战思维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那个特定政治氛围中冷战妄想狂的文化记忆。在这部堪称冷战史诗的小说里，德里罗将形式实验、伦理教诲、政治批判和记忆重构有机融合在一起，体现了作家的道德良知，表达了对人类未来走向持久和平的祈盼。

Works Cited

- 陈后亮：“搭建文学批评与社会现实的桥梁：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文学跨学科研究》1（2021）：38-45。
- [Chen, Houliang.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ocial Reality: The Value Choic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1 (2021): 38-45.]
- Chen, Lizhen. “Rejuven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 (2019): 389-414.
- 程栋：伦理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 [Cheng, Dong.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 Beijing: Peking UP, 2008.]
-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 [Liang, Shumi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2nd ed.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刘英：“回归抑或转向：后现代语境下的美国文学伦理学批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90-97。
- [Liu, Ying. “Return of Turn: Ethic Criticism i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Postmodern Context.” *Nankai Journal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2006): 90-97.]
-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 [Montesquieu, Charles Lois. *De l’Esprit des Lois*. Vol. 1. Trans. Xu Mingl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 聂珍钊：“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生态危机解困之路”，《外国文学研究》1（2020）：22-33。
- [Nie, Zhenzhao.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Human Subjectivity: A Possible Solution to Ecological Cris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20): 22-33.]
-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
- [—,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2020): 71-92.]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Booth, Wayne C. *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 of California P, 1988.

- DeLillo, Don. "The Power of Histor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7, 1997. 60-63.
- . *Underworld*. New York: Scribner, 1997.
- Dobson, Andrew. "States, Citizens, and the Environment." *States and Citizens: History, Theory, Prospects*. Ed. Quentin Skinner, Bo Stråth.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208-225.
- Emerson, Ralph Waldo.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Major Poetry*. Ed. Albert J. Von Frank.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2015.
- Fitzpatrick, Kathleen. "The Unmaking of History: Baseball, Cold War, and *Underworld*." *Underworlds: Perspectives on Don DeLillo's Underworld*. Ed. Joseph Dewey, Steven G. Kellman, and Irving Malin. Newark: U of Delaware P, 2002. 144-60.
- Gaddis, John Lev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 2005.
- Glass, Andrew. "Bernard Baruch coins term 'Cold War', April 16, 1947."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0/04/bernard-baruch-coins-term-cold-war-april-16-1947-035862>. Web. January 8, 2021.
- Jameson, Fredric.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198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Lachmann, Renate. "Mnemonic and Intertextual Aspects of Literature."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Ed. Astrid Erll, Ansgar Nünning. Berlin: De Gruyter, 2010. 301-10.
- Leopold, Aldo.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New York: Oxford UP, 1949.
- Orwell, George. "You and the Atom Bomb." *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Volume IV): In Front of Your Nose 1945-1950*. Ed. Sonia Orwell, Ian Angus. London: Martin Seeker & Warburg, 1968. 6-10.
- Poggi, Gianfranto. "Citizens and the Stat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tates and Citizens: History, Theory, Prospects*. Ed. Quentin Skinner, Bo Stråth.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39-48.
- Ross, Charles. "A Conceptual Map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Nie Zhenzhao."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5): 7-14.
- Ruppersburg, Hugh and Tim Engles, eds. *Critical Essays on Don DeLillo*. Boston: G. K. Hall, 2000.
- Sorley, W. R. "The Morality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1. 4 (Jul. 1891): 427-46.
- Updike, John. *Rabbit at R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 朱荣华: "《地下世界》中的技术伦理", 《外国文学评论》(1) 2012: 185-200。
- [Zhu, Ronghua. "Technological Ethics in Don DeLillo's *Underworld*."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2012): 185-200.]